

古乐初现——甘青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乐器研究

龙忠，张鹏飞，叶苗卉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DOI:10.61369/HASS.2026010044

摘 要：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乐器，主要以陶鼓、陶埙、陶铃为代表，三类乐器的形制特征、源流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研究表明这些乐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还在乐舞、祭祀、宗教仪式及权力象征等社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乐器见证了史前器乐艺术萌芽，折射出史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关 键 词：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彩陶乐器

Ancient Music Emerges - Research on New Stone Age Colored Pottery Musical Instruments Found in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Long Zhong, Zhang Pengfei, Ye Miaohui

School of Fine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painted pottery musical instruments unearthed in the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mainly include pottery drums, pottery flutes, and pottery bells.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s, origin, and social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instrume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instruments not only have practical functions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music and dance, sacrifices, religious rituals, and power symbols. These instruments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prehistoric instrumental music art and reflected the multi-unity pattern of prehistoric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olithic Age;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 painted pottery musical instruments

引言

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孕育的重要阶段，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其中乐器的诞生源于先民的生产实践，成为原始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远古乐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打击乐器，在石器制作和木器加工过程中，人们受敲击声响启发，创造了陶鼓、石磬、木鼓等打击乐器；其二是吹奏乐器，如骨哨、陶哨、陶埙、骨笛等旋律乐器；其三是摇响乐器，通过摇动来发声，以陶铃为代表。本文对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乐器类型、源流及社会功能进行详细论述。

一、甘青地区出土彩陶乐器的主要类型

（一）陶鼓

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鼓多为单面鼓，早期呈桶状，逐渐演变为器身呈瓶状、罐状或喇叭状，由泥条盘筑法制成，分粗细两端，粗端蒙兽皮为鼓面，细端起共振扩音与平衡作用。1980年秦安县邵店村出土的仰韶文化绳纹陶鼓（图1），为大地湾三期，由泥质橙黄陶制成，高65厘米，颈部带有四个角状倒勾纽，用以固定鼓皮，是一件距今约6000年的陶鼓。定西市安定区西寨乡堡子坪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绳纹瓶形灰陶鼓，距今约4700至5000年，呈瓶形

状，鼓腹平底，器形硕大，通体饰粗绳纹，口沿堆塑九枚鬃纽，用于固定鼓皮，肩部对称散音孔，兼具通气与搬运功能。

永登县大通河东岸乐山坪出土有七件陶鼓。陶鼓由贯通的大头、筒状中腔和小头组成，喇叭口外沿分布6至12个鹰爪状泥突，陶鼓两端有环耳，器表饰有黑红相间锯齿纹、漩涡纹，其纹饰兼具马厂类型早期与半山类型晚期特征，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藏有十余件同类陶鼓，其中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漩涡纹彩陶鼓，陶鼓两端各有一耳，端为喇叭口，另端为罐形口，喇叭口外有六个爪突；口沿内绘锯齿纹，鼓身绘黑色旋纹。折带网格纹彩陶鼓为黑红彩折带网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家窑文化彩陶符号的甘肃标识体系构建研究”（2025YB12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龙忠（1986.09-），男，汉族，甘肃武都，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学理论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彩陶艺术，石窟寺美术；

张鹏飞（1994.02-），男，汉族，甘肃武都，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彩陶艺术，石窟寺美术；

叶苗卉（2002.04-），女，汉族，河南南阳，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彩陶艺术，石窟寺美术。

纹，具有半山类型彩陶纹饰的典型特征。



图1 绳纹陶鼓，仰韶文化，1980年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出土，大地湾博物馆藏（笔者摄）

半山、马厂类型彩陶鼓，相比较早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鼓，鼓的敞口端明显变大，小口端缩小，通体绘有锯齿纹、旋涡纹或折带纹，纹饰越来越简约。陶鼓外观形状的变化，不仅仅是形制层面的规范和完善，更是陶鼓发声功能方面的变化，鼓腔、鼓面增大，陶鼓的发音功能也得到增强，鼓声也随之变大^[1]。

（二）陶埙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269号墓出土了完整的鱼形埙，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3590±100-3340±100年^[2]。埙形制大体相似，呈扁平鱼形，鼓腹中空。器表光洁，饰彩绘几何纹、回纹及网纹等图案。鱼嘴部为吹孔，鱼尾处有对穿孔，可挂绳。两肩及腹部左下侧各有一个音孔。音孔位置固定，标志着鱼形埙形制发展的成熟^{[3][74]}。该遗址共出土20余件陶埙，部分破损，但多数保留基本形制。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陶埙（图2）呈半圆形，有两孔；出土的另一件鱼形彩陶埙，口沿绘平行线，腹部饰三角纹、网格纹，尾部为直线与折线纹，呈扁平鱼形，头部设圆形吹孔，腹部左右两侧及下方各有一音孔。可见火烧沟出土的陶埙已具备多孔结构，能演奏简单旋律，标志着其完成了从工具到乐器的转型。



图2 陶埙，青铜时代四坝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400年），1976年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笔者摄）

图3 网纹提梁彩陶铃，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1956年皋兰县糜地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陶铃

陶铃是新石器时代极具代表性的陶制乐器。甘肃皋兰糜地岘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网纹提梁彩陶铃（图3），器身饰网纹，顶部设提梁，其空心腔体内置陶丸或石子，摇晃时可发声。广河县出土的齐家文化兽首红陶铃，顶部塑兽首装饰，眼睛、嘴部等细节写实。此外，1992年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出土1件陶铃^[4]。

二、新石器时代彩陶乐器的源流问题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乐器以陶制为主，以陶鼓、陶埙、陶铃最具代表性，其起源是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学者卡尔·布赫尔认为，音乐起源于劳动过程，相应地，器乐也是这样起源的^{[5][190]}，出现最早的乐器应是各种各样的鼓^{[5][191]}。格罗塞也认为人类最早的乐器，无疑是噪声，并指出鼓是如今许多狩猎民族唯一的乐器^{[6][217-222]}。《经考》载：“土鼓，乐之始也。”^{[7][144]}《礼记·明堂位》云：“土鼓，蕤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8][366]}伊耆氏时代已有土鼓，这些彩陶鼓正是文献记载的土鼓。

陶鼓的起源与原始部落的乐舞、祭祀、征战等活动密切相关，成为史前最具代表性的打击乐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鼓”的大地湾仰韶文化绳纹陶鼓（图1），它的发现印证了中国早期乐器以打击乐为先的发展规律，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陶鼓实物之一。除甘肃境内马家窑文化外，在山西陶寺遗址，也出土有4000多年前的陶鼓^[9]，与马家窑文化彩陶鼓形成时空呼应。《周礼·春官·箛章》记载：“掌土鼓、鹵箛。中春昼击土鼓，吹《鹵》诗以逆暑。”在注文中云“土鼓：上古乐器。以瓦为腔，以革为两面，可击。亦称瓦鼓。”^{[10][221]}这里以瓦为框的土鼓有两面，应不是目前学界认为的单面鼓，而是两头均有鼓面。

关于陶埙的起源，陇菲认为陶埙最初是在陶哨、骨哨基础上发展而来^[11]，王泽丰也认同埙与哨同源^[12]。亦有学者认为陶埙是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产物，其雏形或许是一种用于特定场合的“响器”^{[13][65]}。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制陶技术的成熟，陶埙逐渐脱离实用功能，发展为旋律乐器。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陶埙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两枚距今约6700年的陶埙^{[14][183]}。其中一枚有两个上下贯穿的孔，另一枚仅有一个孔，这些陶埙已具备一定的吹奏功能，能发出两个音。至新石器晚期，陶埙制作工艺日趋成熟，其中山西万荣县瓦渣斜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2音孔灰陶埙，郑州具茨山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1音孔陶埙，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2音孔埙^[15]。黄翔鹏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商代早期，“陶埙已由二音孔发展到三音孔，从而使三声音列发展到四声、五声乃至可能达到六声的音阶序列。”^{[14][187]}除了黄河流域外，在长江流域也出土有陶埙。由此可增强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认识，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统一性。

陶铃的起源可追溯至仰韶文化，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陶铃3件；浙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二期文化层和灰坑中出土陶铃2件；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陶铃1件；大河村遗址出土4件灰陶铃。此外，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文化层中均出土有陶铃，可见陶铃的分布很广泛。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末期，陶铃广泛流行于黄河中下游、江淮地区以及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

目前所见最早陶铃在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和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二期遗存中。高炜先生认为龙岗寺和下王岗仰韶文化陶铃，原始形态与进步形态并存，并且不是陶铃起源的最初阶段，陶铃的源头应距今七八千年前，也可能更早。李纯一则认为无钮陶铃可能由平底容器演化而来，或脱胎于摇响器。无论是马厂类型网纹提梁彩陶铃，还是齐家文化兽首红陶铃，都是摇响类陶铃，内置陶粒，摇动发声，其源流均来自中原仰韶文化的陶铃。

三、新石器时代彩陶乐器的社会功能

古人将乐器按制作材质分为“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10]214}。主要被用于乐舞活动、祭祀、原始宗教、征战以及狩猎等。

1. 乐舞活动。陶鼓的核心功能为史前先民的神秘活动提供节奏支撑。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同德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证明，早在五千年前先民已形成有组织的乐舞活动。从彩陶盆上舞者整齐的动作推断，当时或存在节奏强烈的打击乐器来统一舞步，这种乐器极有可能就是陶鼓，协调集体舞蹈中的踏步和旋转动作。

2. 祭祀。文献记载土鼓是祭祀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籥章》载：“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0]221}这表明，土鼓在周代官方农耕祭祀礼仪中属于核心乐器。《礼记·明堂位》载：“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8]368}《周礼·地官司徒·鼓人》云：“教为鼓，而辩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军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10]116}均可视为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延续。其中“雷鼓”“灵鼓”“路鼓”“鼗鼓”“鼙鼓”“晋鼓”等用于不同的活动，体现其在沟通人神之间的媒介作用。《周易·系辞上》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在远古时期鼓被用于祈祷风调雨顺、欢庆丰收，其低沉的共鸣被用于祈雨或祭祀，以鼓声象征天雷，祈求上天的回应。

3. 原始宗教与权力象征。在社会功能层面，陶鼓超越了乐器

范畴，成为原始宗教与权力的象征。《山海经·大荒东经》云：“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鼓在黄帝时代已成为权力震慑的礼器，其超自然的描写，实为政治话语的隐喻。

4. 征战、狩猎。乐器在征战和狩猎活动中发挥有重要作用。其一，乐器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声音响亮的乐器可传达指令、警报或集合信号。其二，鼓舞士气，节奏强烈、声音宏大的乐器能激发战士和猎手的斗志与勇气，从而勇敢地面对危险和挑战。其三，用于威慑敌人或猎物，一些乐器发出的声音可对敌人或猎物产生威慑效果。其四，具有仪式和祭祀功能，征战和狩猎前后常举行仪式或祭祀活动，乐器在其中也不可或缺。其五，乐器节奏可帮助猎手在行动中保持一致步伐和节奏。征战时，整齐的鼓点也能让军队行动协调有序，提高战斗力。

四、结语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陶鼓、陶埙、陶铃等彩陶乐器，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精神世界的物化载体，他们用泥土塑造形态，以声音传递意义，见证了史前器乐的萌芽，勾勒出早期中华文明迈向成熟的关键阶段。这些静默的彩陶乐器，至今仍在诉说着先民的智慧与想象，是史前先民音乐实践的具体形态，更是探索中国乐器起源的关键物证，已成为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缩影。

参考文献

- [1] 尹德生. 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01(2): 33.
- [2] 马清林, Heinz Berke. 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红-黄色混合颜料的再分析 [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06, (01): 4.
- [3] 申莹莹. 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乐器研究 [D]. 中央音乐学院, 2012: 174.
- [4] 陈守德. 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出土珍稀文物——陶铃 [J]. 考古与文物, 1994(7): 101.
- [5] [苏] 柯斯文. 原始文化史纲 [M]. 张锡彤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190, 191.
- [6] [德]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M]. 蔡慕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17, 222.
- [7] [清] 戴震撰. 经考 (卷四) [M]. 民国二十一年安徽丛书编审会辑影印安徽丛书本, 144.
- [8] [元] 陈澧注, 金晓东校点. 礼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66, 368.
- [9] 秦小丽.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出土陶鼓研究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5(2): 29.
- [10] 钱玄注译. 周礼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221, 214, 221, 116.
- [11] 陇菲. 华夏正声出昆仑 [J]. 中国音乐, 2021(4): 81.
- [12] 王泽丰. 埙哨同源——从原始社会古埙的尺寸和音响性能看埙的起源与用途 [J]. 歌海, 2021(6): 69.
- [13] 李纯一著.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65.
- [14] 黄翔鹏. 新时期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 [A]. 黄翔鹏文存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183, 187.
- [15] 郭树群. 上古出土陶埙、骨笛已知测音资料研究述论 [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8(5): 33.